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 价值核心的阐释与展示设计手法

■ 陈曦 霍焱

1. 研究背景

考古遗址公园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我国于2009年正式提出的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展示与利用的新方式。在国际上,考古遗址公园也已被证明是一种切实有效并已日趋成熟的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

考古遗址公园一方面为遗址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促进考古研究、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助系统化、人性化的遗址本体和整体环境景观的阐释与展示设计,引导公众走近遗址、了解遗址,使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因此,考古遗址公园的阐释与展示设计成为凸显和释读遗址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共35处遗址中,包括建筑基址、古墓葬群、聚落遗址、城址或宫殿址等众多类型。其中,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占总数量的二分之一强,包含了隋唐洛阳城、大明宫、扬州城等中国古代重要城址,是考古遗址公园的主要组成类型。

2. 城址类考古遗址的价值核心

与其他考古遗址类型相比,城址类考古遗址往往规模巨大、使用时期较长、遗存众多且不同年代遗存相互叠压现象十分普遍。在对遗址内各类遗存进行正确认知和实施长久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如何准确、全面、合理、直观地揭示城址类考古遗址的价值核心,是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阐释与展示设计面临的首要问题。

城址类考古遗址价值核心的认定,可为考古遗址公园设计提供清晰的阐释与展示对象和设计目标。将设计与揭示遗址的过程建立起逻辑关系,从而解决“设计什么”及“做什么样设计”的问题。

笔者认为,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的价值核心在技术层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

下文将分别从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三方面,以实例论述城址类考古遗址价值核心的确认,及以此为基础的阐释与展示手法探讨。

3. 价值核心的阐释与展示手法

3.1 文化价值及其展示手法

城址类考古遗址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的重要例证,也是历史上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和见证地。城址类考古遗址的文化价值超越了单体古迹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文化价值的核心更多体现在以空间为横轴的城址(宫殿址)规模范围、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历史环境和以时间为纵轴的城址(宫殿址)迁移、历史事件等宏观层面。

基于对城址类考古遗址文化价值核心的认定,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阐释与展示设计对象也主要集中在承担其价值核心的遗址载体上。通过诸多阐释与展示手法,如本体展示(揭露、覆罩);复原展示(重建);标识展示(地面翻模标识、构筑物标识、植物标识、铺装标识、轮廓标识);图文展示(标识牌、解说牌、模型沙盘);互动展示(模拟考古、手工作坊);数字体验展示(音频、视频)等,揭示城址类考古遗址的重大文化价值。

案例一: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

以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设计为例,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区内,存留了唐代东都洛阳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天堂及周边廊房,同时叠压了隋、唐、宋三代宫殿遗迹,也是武则天登基、薛怀义火焚天堂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其考古遗址文化价值核心及主要阐释与展示对象,除天堂、明堂单体建筑外,主要集中在空间结构、历史环境、宫殿址迁移、历史事件四方面。其阐释与展示设计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如下:

挑战一:如何与明堂、天堂保护展示建筑相呼应,展示盛唐时期宫城区的空间结构和布局。



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鸟瞰效果图

应对策略：由于明堂、天堂保护展示建筑体量高大，本设计中唐代廊房遗址采用三维构筑物标识展示手法，以玻璃展示墙作为主要设计元素，标示廊房空间，并辅以植物标识方法，在廊房遗址外缘种植玉兰树阵，以强化廊房空间体量。使廊房标识设施与天堂明堂保护建筑相呼应，展示完整的唐代宫城区空间结构和布局。

挑战二：如何追溯和营造盛唐时期的历史环境风貌。

应对策略：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查阅《大业杂记》等文献可知，洛阳自古便为繁花簇锦之地，历史上曾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美誉，本设计便以“花”为主题，选取有史可考的花木品种营造历史氛围，如玉兰，玉兰自隋唐便作为名贵花木广泛栽植于宫廷园囿之内，为中国古代园林植物“庭院八品”（玉兰、海棠、牡丹、桂花、翠竹、芭蕉、梅花、兰花）之首，象征华贵高洁。将玉兰作为宫城区的主题植物，在唐代廊房外侧成列种植，树下设置牡丹种植池，并间植海棠，三种植物取“玉堂富贵”之意。及至初春玉兰盛放，海棠、牡丹次第争妍，宫城遗址区亦再现大唐繁花簇锦的壮美景象。



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唐代廊效果图

挑战三：如何用相对统一的风格清晰阐释和展示隋、唐、宋三代遗址各自的遗产构成和相互叠压关系。

应对策略：隋、宋两代宫殿址及廊房遗址，因叠压和被现代道路切割而均无法形成完整格局。本设计采用铺装标识及使用不同的主题草本植物等平面标识手法与唐代廊房三维标识相区别，同时应用与唐代廊房相同的标识材料——玻璃，标识隋、宋廊房轮廓，使三代遗址展示设施既相互区

别又风格统一。

挑战四：如何在室外预留足够的讲解空间，讲述场地内曾发生过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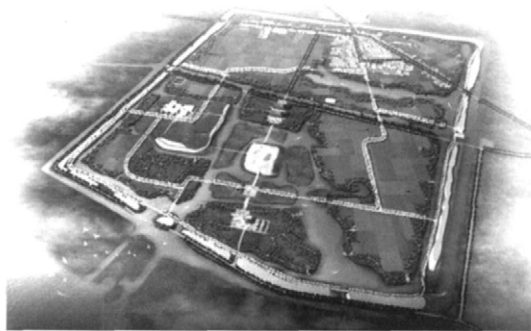
应对策略：场地历代发生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标识牌与解说牌难以提供足够的阐释空间。玻璃展示墙的设置，除有标识廊房空间结构的功用，亦可在其上大量印刷历史文献记载和历史图片，结合合理的展示流线，使整个园区都成为露天历史展厅。

案例二：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再以黄国故城为例，黄国故城为春秋时期黄国城址所在地，也是黄姓起源地，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西约6公里隆古乡境内，面积约2.68平方公里。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清晰地展示了黄国故城遗址区内的城市格局和功能，即场地西侧以大型夯土群为核心的宫城区、以黄君台为核心的祭祀区，在两大功能区外均有壕沟环绕并互相勾连。外围城墙及内外环壕形成郭城的防御体系，并有水道与场地南部的老龙埂水库相连，其完整的水城形态在众多先秦城址中非常罕见。

因此，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价值核心及阐释与展示设计对象，主要集中在其城址的规模范围、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及历史事件四方面。本设计主要应用如下策略：

策略一：实施残余城墙及黄君台的本体保护，标识城址规模范围。



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鸟瞰效果图

策略二：采用地表翻模标识方法标识大型夯土群，强化功能分区。

策略三：修复古河道，完整再现黄国故城的水城形态。

策略四：设置黄姓主题文化展示馆及遗址陈列馆。并应用黄国故城出土玉器作为公共设施设计母题。

3.2 生态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除具备重大的文化价值，其也应和其他类型城市公园一样，纳入城市绿地系统及生态基础设施范畴，承担起城市绿肺的功能，发挥其生态价值，形成展示生态文明的独特场所。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可为城市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包括雨洪净化和调蓄、吸收碳排放、维护地域景观特色、提供乡土物种栖息地等综合服务功能。

案例一：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仍以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为例，目前黄国故城遗址区内自然生境已遭破坏并不断退化，田地荒芜、坑塘干涸、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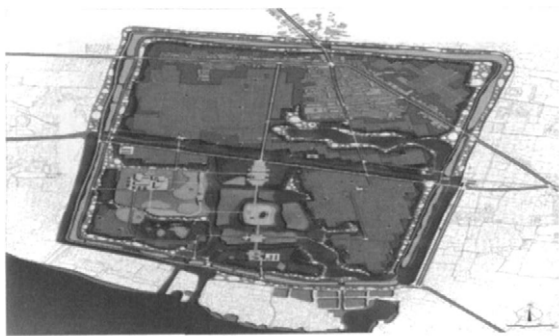
境卫生较差。其生态修复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如下：

挑战一：如何恢复场地肌理的历史记忆，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

应对策略：古河道生境修复——构建湿地生态水网。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利用外城壕、内城壕及灰沟范围内用地构建湿地生态水网，恢复古河道肌理，并联通老龙埂水库，保证湿地水源，从而也将故城遗址区湿地纳入城市绿地水网生态体系。

根据场地现状及考古发掘的水道规模，可将湿地分为二级淹没区域。在一级汇水区域设计为湿地永久性水域，在二级汇水区设计为湿地间歇性水域，弹性汇水区域的划定，将有助于调蓄雨洪。一二级淹没区通过适度填挖工程措施建造地形微差，从而形成流水落差，加速物质能量流动。同时在二级淹没区域设置湿地泡系统，依据“边缘效应”的生态学原理，众多湿地泡有着比单一同等面积水域更丰富的生态效益，更利于生境的良性恢复和健康发展。湿地泡采用多样性的种植方式，以适应不同水位的植物生长需求。



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总平面图

挑战二：如何提升场地生态服务功能。

应对策略：场地基底修复——构建生态花田。

在考古发掘出的重要遗址之外，梳理场地现有农田肌理，并以其为依据构建生态花田系统，使用大量乡土禾本科湿生植物和野花组合，如芦苇、黄菖蒲、吉祥草、二月兰，形成季相变化丰富和高低错落的植被景观。乡土物种的大量使用可降低维护成本，充分让自然做功，形成低碳和负碳景观，构建场地绿色生态基底。

经过生态水网系统及生态花田系统的建设，场地不仅强化并重现了历史肌理，其所表现出的林地、草甸、沼泽、水域等不同生境，也有助于形成多样的动植物群落及其环境的良性自循环和演替，可确保为场地构建一个稳定完整的生态系统。

案例二：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

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由于规模较小，且处于城市中心区，用地紧张，可作为生态修复的区域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唐代廊外围及各遗址之间的空地。设计主要应用如下策略：

策略一：在唐代廊外围地块密植浅根系树种，如五角枫、鸡爪槭、红王子锦带等，形成良好的屏蔽的作用，遮蔽周边快速路的噪声及尾气污染，为园区创造宁静的观赏空间，改善园区局部小气候。

策略二：在满足园区基本游览活动功能前提下，缩减硬质铺装面积，恰当使用芒草作为宋太极殿遗址标识植物，增大绿地比重；并以疏林草地作为未探明遗址区的主要设计手法，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进一步考古发掘提供方便。

3.3 使用价值及其构建方式

城址类考古遗址相较于古墓葬、聚落等类型考古遗址，往往沿用时期较长，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有的遗址现在仍处于城市建成区中心，如隋唐洛阳城、扬州城等。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将更注重其对于社会公众使用价值的挖掘。在有效保护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的生态承载力前提下，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将促进考古遗址与现代生活更好融合。包括为社会民众提供遗址参观、游览及日常休憩的活动场地及历史文化教育基地等功能，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果惠及民众。

策略一：构建多样的体验网络。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可通过建设机动车道、自行车（电瓶车）道、游步道及水上航线、空中游览等多种方式，结合各级广场，构成一个完整的“线网+节点”的体验网络，使游客获得丰富的景观体验。机动车道建议在园区外围设置，内部以电瓶车或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以降低对遗址的潜在破坏并避免环境污染。

策略二：构建健全的配套设施系统。

健全配套设施，将有利于园区游客组织及管理运营的合理化和正规化。配套设施包括遗址展陈设施、标识设施、管理设施、公共设施、服务设施五大类，是园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遗址展陈设施：遗址陈列馆、考古活动中心、考古工作站、保护展示棚。

②标识设施：标识牌、解说牌、安全防护线等。

③管理设施：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管理用房。

④公共设施：厕所、观景亭、垃圾桶、座椅、观景平台、亲水平台、活动场地等。

⑤服务设施：游客服务中心、电瓶车换乘处、自行车租赁处、游船码头、停车场、商亭。

此外，各种观览、互动和表演活动的组织以及营销推广等软件工作，也均有利于遗址公园使用价值的实现和扩大。

4. 结语

综上，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历史遗存、自然生境和人类活动叠加的复杂场地，其规划设计需兼顾三方的协调演进和持续发展。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展示与阐释设计的关键在于对其遗址价值核心的正确认知，对于遗址在文化、生态及使用三方面的价值认定，将有助于明确设计对象与设计目标，从而推演出合理的考古遗址公园的空间规划和展示设计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